

目标分歧、体系环境与盟国的战略自主性追求^{*}

卢颖琳 徐进

【内容提要】 战略自主性是指在不对称同盟中盟国能够违背主导国的意愿,甚至抵抗其施压,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自主做出战略选择。冷战时期,在东西方阵营中都曾出现过一些相对弱勢的盟国顶住主导国压力追求战略自主性的现象。与同盟主导国目标分歧的兼容性和体系环境的变化是影响一国将战略自主性从偏好转化为行为的两个核心变量。当目标分歧属于不可兼容型时,为防止遭受损失,盟国倾向于承担风险,其追求战略自主性的可能性较高;当目标分歧属于可兼容型时,为获取更多利益,盟国倾向于规避风险,其追求战略自主性的可能性较低。但当体系环境发生变化时,盟国为了抓住机会窗口,可能宁愿承担较高风险也要谋求战略自主性。通过比较冷战时期的美法关系和苏波关系,可以检验盟国的战略自主性从偏好到行为的转化条件及机制。上述发现不仅有助于利用美国盟国的战略自主性选择以牵制和分化美国同盟体系,也为中国管理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带来了启示。

【关键词】 战略自主性; 不对称同盟; 两极格局; 目标分歧; 体系环境

【作者简介】 卢颖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徐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邮编: 100732)。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23)06-0147-20

^{*} 本文系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项目研究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自负。

一 问题的提出

长久以来,盟国追求战略自主性(strategic autonomy)的行为往往被视为对同盟主导国的离心倾向。既有研究通常从同盟管理(alliance management)视角研究主导国如何加强内部的“向心力”、减少“离心力”,^①却较少从盟国角度探究其追求战略自主性的动因和条件。与此同时,同盟理论还认为,在不对称同盟内部主导国可以抑制和约束盟国,盟国的战略自主性会受到较大限制。^②罗伯特·奥斯特古德(Robert E. Osgood)和保罗·施罗德(Paul W. Schroeder)认为,除发挥聚集实力保卫安全的功能外,同盟还可以充当管理和约束盟国的工具。^③不对称同盟内部能否成功实现抑制,取决于较强大的盟国是否愿意调动其权力资源。实力更强大的盟国总能在抑制博弈中取得成功。^④如在两极格局下,由于体系中的两个主导大国对现行国际格局较为满意,因此都愿意约束各自阵营内的盟国追求战略自主性的倾向。^⑤

^① 关于同盟管理的文献,参见 Glenn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David A. Lake, *Entangling Relation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Its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Thoms J. Christensen, *Worse than 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苏若林、唐世平《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3期,第6—38页;刘丰《美国的联盟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6期,第90—106页。

^② 关于同盟限制的文献,参见 Patricia A. Weitsman, *Dangerous Alliances: Proponents of Peace, Weapons of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Galia Press-Barnathan, “Managing the Hegemon: NATO Under Unipolarity,” *Security Studies*, Vol.15, No.2, 2006, pp.271-309; George Liska, *Alliances and the Third Worl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24-25; Stephen Van Evera, “Primed for Peace: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5, No.3, 1990/1991, pp.7-57; Steve Weber, “Shaping the Postwar Balance of Power: Multilateralism in NA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3, 1992, pp.633-680;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Why Write Them Dow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 2000, pp.63-83。

^③ Robert E. Osgood, *Alliance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8, p.22; Paul W. Schroeder, “Alliances, 1815-1945: Weapons of Power and Tools of Management,” in Klaus Knorr Lawrence, ed.,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6, p.241。

^④ Jeremy Pressman, *Warring Friends: Alliance Restrain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⑤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Measuring Systemic Polarity,”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19, No.2, 1975, p.128; 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Doubleday, 1966, p.128; Thomas J. Volgy and Lawrence E. Imwalle, “Hegemonic and Bipolar Perspectives on the New World Orde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9, No.4, 1995, pp.819-834; Morton A. Kaplan, “Balance of Power, Bipolarity and Other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1, No.3, 1957, p.693。

然而,历史事实与同盟理论的逻辑并非完全一致。在美苏两极格局下,无论是身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还是身处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法国、联邦德国、韩国、中国、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都展现出对战略自主性的追求。在两极格局下,处于不对称同盟中的盟国什么时候会选择追求战略自主性?^①盟国虽然都有追求战略自主性的偏好,但并不一定都会将其转化为具体行动。因此,探讨战略自主性从偏好到行为的转化条件对于进一步深化同盟理论和为外交决策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战略自主性既是战略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同盟理论研究的有益补充,有助于中国外交利用美国盟国的战略自主性达到牵制和分化美国盟国的成效。

二 既有研究述评

既有同盟政治研究中对主导国如何管理和维系同盟的讨论较为充分,而对盟国如何在不对称同盟中追求战略自主性及其所需条件的探讨却较为薄弱。总体上既有研究更多是将战略自主性作为描述性而非分析性工具,未能建立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但对盟国战略自主性的解释提供了三类值得借鉴的分析视角。

一是体系结构论。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认为,两极结构下的国际政治不存在边缘地带,任何遥远地区发生的事态都会引发两个超级大国的关注,两个超级大国中任何一方的举动和政策变化都逃不出另一方从势力均衡角度计算权衡的范畴。^②杨原和曹玮认为,当两个超级大国势均力敌且双方都无法在各方面占据压倒性优势时,小国可以通过实施对冲战略与两面结盟策略追求战略自主性,并以古代朝鲜半岛国家分别与北宋和辽同时结盟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案例验证。^③姜鹏则将两极格局作为背景常量,通过对同盟的类型进行细分发现,虽然存在约72%的大国在享有较强战略自主性的同时也能够成功约束盟国,但是约19%的大国未能成功约束弱势盟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享有结盟自主权的地区中小国家往往能够被

^① 关于“战略自主性”这一议题,可以分为盟国是否真的想去做这件事以及能否做得成这件事。二者的逻辑是不一样的,本文研究的是前者。

^② Kenneth N. Waltz, “The Stability of a Bipolar World,” *Daedalus*, Vol.93, No.3, 1964, pp.882-883.

^③ 杨原《大国政治的喜剧——两极体系下超级大国彼此结盟之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2期,第38—68页;曹玮、杨原《“两面结盟”分类与大国共治逻辑——兼答周方银、王旭彤对〈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的评论》,载《当代亚太》,2018年第1期,第67—98页。

两大阵营和两个超级大国竞相拉拢并待价而沽。^① 这些研究虽然关注到两极体系下国家谋求战略自主性这一现象,但是从体系结构出发的解释仍存在不足,实际上仅在极少数情形下国际体系结构能够提供国家追求战略自主性时所面对的外部约束和机遇的明确信息。因此,不仅国际体系的结构会影响国家是否以及如何谋求战略自主性,国际体系的结构性调节因素如体系清晰度和战略环境的性质也会产生作用。

二是实力决定论。实力聚合模型(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认为各国结盟是为了使单个国家的实力得以聚集,通过增强力量以制衡共同敌人,维护国家安全。^② 对于同盟主导国来说,与他国结盟的原因在于增强自身权力并壮大同盟实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同盟主导国需要通过扶持盟国来获取支持与帮助。但是,为防止过度扶持而促使盟国的战略自主性提高,同盟主导国只会实行有限扶持,确保盟国的偏好和行动与主导国保持一致。^③ 由此可见,建立同盟既是主导国增强自身安全的工具,也是管理和约束与盟国双边或多边关系的手段。^④ 通过建立不对称双边同盟或多边同盟体系,主导国既可以把盟国牢牢地控制在同盟范围内,也可以降低自己被卷入非本意战争的可能性。^⑤ 虽然结构性权力位差普遍存在于所有同盟中,但既有研究没有解释为什么在不对称同盟内部主导国无法约束盟国的特定现象。在一些不对称性同盟中,即使盟国与主导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并未缩小,但盟国依旧会追求战略自主性。例如,在美韩实力未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朴正熙政府从1968年就开始追求在美韩同盟框架下的自主防务。

三是自主—安全交换论。迈克尔·奥特菲尔德(Michael F. Altfeld)认为,国家间之所以结成同盟,是在安全、自主性和财富的交易中进行权衡的结果,安全是国家

^① 姜鹏《砝码国家何以自抬身价?——两极格局下同盟政治中的“科林斯难题”研究》,载《东北亚论坛》,2019年第5期,第27—47页。

^②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3;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Addison-Wesley, 1979;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③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83, p.101.

^④ Paul W. Schroeder, "Alliances, 1815-1945: Weapons of Power and Total of Management," in Klaus Knorr, ed.,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6, p.241.

^⑤ Victor D. Cha,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4, No.3, 2009/2010, pp.158-196; Victor D. Cha, *Powerplay: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结盟的收益,自主性和财富则是国家为获得自身安全而加入同盟的成本。^①詹姆斯·莫罗(James D. Morrow)在奥特菲尔德观点的基础上构建了自主—安全交易模型(the autonomy-security trade-off model),认为在不对称同盟中自主与安全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小国以出让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换取大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因此会做出“允许实力较强的盟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其外交和国内政策,或者允许实力较强的盟国投射力量以推动其他利益”等“自缚手脚”式的让步。大国则以向小国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使其出让自主性从而提高自身决策的自主性。^②既有研究较多地讨论了小国与大国在不对称同盟中就自主性与安全利益进行交换的现象,并未进一步探究小国如何在保持同盟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出让更少的自主性去获得更多安全利益。从小国视角研究不对称同盟中拓展战略自主性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

三 战略自主性的理论阐释

自主性是一个涉及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和法学等领域的概念,指行为体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动机、能力或特性。艾里克·诺德林格(Eric A. Nordlinger)将其概括为“任何社会实体的自主性指向为它的偏好与实践之间的契合”。^③自主性概念具有多重含义,在国际关系领域通常以三种方式加以使用。一是作为原则/权利的自主性,等同于“威斯特伐利亚意义上的主权”。二是作为条件/特性的自主性,是允许民族国家独立表达并完成政治目标的条件,或国家能(或不能)享有的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介于完全依附和完全自主两个极端理想类型之间。这层含义同时适用于国内与国际语境。三是作为客观国家利益的自主性。^④本文所使用的自主性概念以第二种方式为基础。

^① Michael F. Altfeld, “The Decision to Ally: A Theory and Test,”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37, No.4, 1984, pp.523-544.

^②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5, No.4, 1991, pp.904-933.

^③ 埃里克·A.诺德林格著 孙荣飞等译《民主国家的自主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④ Roberto Russel and Juan Gabriel Tokatlian, “From Antagonistic Autonomy to Relational Autonomy: A Theoretic Reflection from the Southern Cone,”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45, No.1, 2003, pp.1-2; Stephen D. Krasner, “Globalization and Sovereignty,” in David A. Smith, Dorothy J. Salinger and Steven C. Topik, eds., *State and Sovereignty in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35;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38.

从内涵上来讲,“战略”本是军事术语,其解释局限于战争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涵不断完善,一般被解释为“调动一切力量与资源以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艺术与科学”。^①也有学者认为战略概念本身难以界定,^②但无论如何界定,战略一词都代表了全局性和长时期内实施的重大事项。

结合既有定义,本文认为,战略自主性是指在不对称同盟中,盟国能够违背主导国的意愿甚至抵抗其施压,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问题上自主做出战略选择,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四个领域。此外,本文将不对称同盟界定为两个或多个实力不对称的主权国家在安全合作方面做出的正式安排。

(一) 理论前提

本文假定国家是一个有限理性的行为体,谋求自身的战略自主性是国家的内生偏好。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国家天然具有追求战略自主性的偏好,但在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每个国家将追求战略自主性的偏好付诸行动的可能性是不一样的。本文仅讨论国家在受到两极体系结构和不对称同盟结构的外在压力下追求战略自主性的可能性。

盟国与主导国时常会在同盟的战略目标上产生分歧,而分歧的大小和严重程度往往会涉及兼容性问题,即当目标分歧大且不可调和时,二者的战略目标不兼容;当目标分歧小且可协调时,则二者的战略目标兼容。盟国与主导国目标分歧的兼容性取决于两个指标:首先,分歧是否与主导国在宏观上追求的最高目标相抵触,若抵触,则二者的战略目标不兼容。其次,分歧是否会伤害主导国的主导地位,若伤害,则二者的战略目标也不兼容。在确认二者的战略目标分歧可协调时,它们仅会在战略目标内容的理解或执行次序上存在不同意见。主导国对于同盟的战略目标有一套完整的理解标准,当盟国对此目标的理解与主导国出现较大程度的偏离时,双方对战略目标实质内容的理解就会出现分歧。执行目标的优先次序可以按照其重要性和时间维度进行划分。比如对于同一个目标,盟国认为其既重要又紧迫,主导国却可能认为其虽然重要但不紧迫,这时双方即出现了目标分歧。

包容性或约束性的战略环境能够披露出体系所提供的信息内容,帮助国家形成对一定时期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③盟国对体系环境的感知主要受两极竞争状态与两

^① 李少军主编《国际战略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13页。

^② 威廉姆·默里、马克·格利姆斯利《论战略》,载阎学通、徐进编《国际安全理论经典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页。

^③ 诺林·里普斯曼、杰弗里·托利弗、斯蒂芬·洛贝尔著,刘丰、张晨译《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6页。

极之间实力对比影响。两极竞争状态的烈度可以通过两极之间举办的首脑峰会和签署的协议数量等来观察。两极之间的实力对比则可以通过对军事、经济和政治实力的比较进行观察。如果两极竞争的烈度高且实力对比有利于同盟主导国,盟国处于约束的体系环境中;如果两极竞争的烈度高且实力对比不利于同盟主导国,盟国处于相对约束的体系环境中;如果两极竞争的烈度低且实力对比有利于同盟主导国,盟国处于相对包容的体系环境中;如果两极竞争的烈度低且实力对比不利于同盟主导国,盟国则处于包容的体系环境中(见表1)。

表1 实力对比、竞争烈度与体系环境

两极实力对比	两极竞争烈度	
	高	低
有利于同盟主导国	约束	相对包容
不利于同盟主导国	相对约束	包容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二) 逻辑机制与基本假说

在具有谋求战略自主性内生偏好的情况下,盟国会对自己与主导国的目标分歧所带来的风险进行评估,并结合对体系环境的感知以决定是否追求战略自主性。本文发现,将前景理论与机会窗口期理论相结合,能够更好地解释战略自主性由偏好转化为行为的逻辑机制。

在战略自主性由偏好到行为的转化具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通过分析盟国与主导国目标分歧属性带来的盈亏态势,能够对盟国的决策倾向进行判断。相较于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决策者都是绝对理性的,并且都试图规避风险和追求效用的最大化。^①前景理论则强调有限理性,更看重相对价值而非绝对所得(absolute wealth)。^②与获

^① 关于预期效用理论应用到国际政治领域的文献,参见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The Contribution of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18, No.4, 1988, pp.629-652; James D. Morrow, "A Continuous-Outcome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of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29, No.3, 1985, pp.473-502; D. Scott Bennett and Allan C. Stam, "A Universal Test of an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of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4, No.3, 2000, pp.451-480。

^② 关于前景理论的研究,参见 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Vol.47, No.2, 1979, pp.263-291; Jack S. Levy, "Prospec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etical Applications and Analytical Problem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3, No.2, 1992, pp.283-310; Jack S. Levy, "Loss Aversion, Framing, and Bargaining: The Implications of Prospect Theory for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7, No.2, 1996, pp.179-195。

得同等收益与损失的情况相比,人们似乎对遭受损失比获得收益更为敏感,对损失的厌恶大于收益带来的满足。前景理论的现状偏好效应和损失厌恶原理改变了对于同盟内部关于成本与收益的传统看法。在联盟维系的过程中,盟国与主导国保持着较高的目标匹配度,并以此作为判断的参考点。若盟国与主导国的目标分歧不可兼容,盟国会将自己与同盟内的处境框定在损失框架中。因为盟国希望实现的战略目标根本不会被主导国所接纳,盟国如果继续试图在同盟内实现自身目标只会不断受挫。根据损失厌恶原理,盟国更倾向于采取战略激进与冒险策略,通过与同盟针对的对象进行互动来防止损失加重而不是接受损失。因此,当盟国与主导国的目标分歧不可兼容时,盟国会有更强烈的意愿实施追求战略自主性的政策。若盟国判断自己与主导国的目标分歧可兼容,则盟国会将自己与同盟针对对象的互动框定在收益框架中。即便与同盟针对对象的互动可扩大自身获利,但由于担心会引起主导国的疑虑、不满甚至破坏同盟关系,盟国常常表现出战略保守和风险规避的特征。由于现状偏好效应的存在,盟国并不想因为可兼容的目标分歧影响既得收益,所以更倾向于维持而非改变现状。因此当自己与主导国的目标分歧可兼容时,盟国往往不会将追求战略自主性的愿望付诸行动。



图1 目标分歧与战略自主性的因果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假说 1a: 如果与同盟主导国的目标分歧不可兼容,盟国选择追求战略自主性的可能性较大。

假说 1b: 如果与同盟主导国的目标分歧可兼容,盟国选择追求战略自主性的可能性较小。

表2 战略自主性转化中的风险偏好

目标分歧类型	盈亏态势判定	风险偏好	转化的可能性
不可兼容	防止损失	冒险激进	较大
可兼容	扩大获利	保守规避	较小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体系环境的变化有助于打开特定的窗口期,并可能更改国家既定的风险偏好,从而影响国家的决策行为。窗口期是不同于平常状态的特殊时期,也是国家对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形势的非瞬息判断和预期。^①在窗口期内国家原先的风险偏好会发生程度不等的变化。^②其根源在于窗口期往往是由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所触发,体系结构的限制受到削弱,既对国家习以为常的模式产生冲击,也给国家更加自如行动提供了机会,其能动性会比平常期更具活力和影响力。因此,只要体系环境发生改变就会打开特定的窗口期。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识别出三个层面的窗口:一是机会窗口和脆弱性窗口,二是长期窗口和短期窗口,三是内部窗口和外部窗口。^③当体系环境从包容变为约束时便打开了脆弱性窗口,当体系环境从约束变为包容时就会打开机会窗口。只有打开机会窗口才会引起“现在比以后更好”的判断。抓住机会窗口期的心理动机会促使国家的风险偏好由保守变为冒险,对于追求战略自主性会有更强的冲动,因为决策者认为,如果不在当下谋求战略自主性,则可能错失最佳时机。此外,决策者通常认为窗口期存续时间短促,因此务必要在窗口关闭之前尽快把握“良机”。此时的机会窗口通常是指由特定战略行为开辟的暂时性战略优势。^④短暂的战略优势通常会鼓动盟国放弃对风险规避的考虑,即使承担风险也要追求战略自主性。



图2 体系环境与战略自主性的因果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假说2:如果体系环境从约束变为包容,盟国将由规避风险变为承担风险,追求战略自主性的可能性较大。

当与主导国的目标分歧不可兼容时,盟国就会具有宁可承担风险也要追求战略自主性的强烈倾向。这种情况下无论体系环境是否发生改变、机会窗口是否打

① 刘旻玮《复合窗口期与体系性冲突的时机》,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4期,第46页。

② Paul F. Diehl and Gary Goertz, *War and Peace in International Rivalr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p.140; 朱立群、聂文娟《社会结构的实践演变模式——理解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的另一种思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期,第15—16页。

③ 斯蒂芬·范·埃弗拉著,何曜译《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9—90页。

④ 徐进《时间维度和战略目标》,载《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1期,第13页。

开,盟国的风险偏好都是战略冒进和风险承担型的。然而体系环境变化会影响到与主导国存在可兼容型目标分歧的盟国。当体系环境从约束变为包容时便会打开机会窗口期。出于抓住机会窗口的考量,盟国的风险偏好会由风险规避变为风险承担,这将大大提高其追求战略自主性的可能性。因此,围绕盟国与同盟主导国的目标分歧、体系环境组合模式及双方对应的行为选择,结合假说1和假说2,可以得出假说3。

假说3a: 如果与主导国的目标分歧不可兼容,则无论体系环境是否发生改变,盟国选择追求战略自主性的可能性最大。

假说3b: 如果与主导国的目标分歧可兼容,当体系环境发生了从约束到包容的改变时,盟国选择追求战略自主性的可能性较大。^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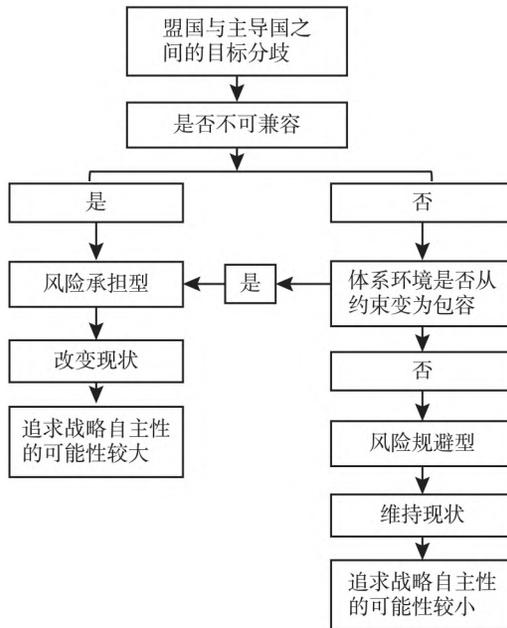


图3 战略自主性因果变量的传导机制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① 从假说体系的完整性而言,还存在两个基本假说,即假说3c: 如果盟国与主导国的目标分歧可兼容,当体系环境没有发生从约束到包容的改变时,盟国选择追求战略自主性的可能性较小;假说3d: 如果盟国与主导国的目标一致(完全兼容),则无论体系环境是否发生改变,盟国选择追求战略自主性的可能性最小。本文侧重研究盟国追求战略自主性的可能性相对较大的情况,所以不对假说3c和假说3d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四 美苏两极格局下盟国的战略自主性

本文选取1958—1967年的美法同盟与1956—1963年的苏波同盟进行案例求异比较。选择这两个案例主要基于四点考虑:其一,限定在美苏两极格局背景下。其二,聚焦于处于不对称同盟下盟国与主导国的竞争对手互动的案例,如法国与美法同盟针对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互动。其三,具备由盟国主动提出拓展战略自主性的事件,如波兰与美国建立起较为友好的经贸关系。其四,可以有效考察前文提出的两个变量如何在盟国追求战略自主性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一方面,与美国的目标分歧不可兼容是法国实施“东方政策”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与苏联涉及理解战略目标内容的分歧和体系环境变化带来的短暂机会窗口是促使波兰追求“波兰式道路”的重要原因。

(一) “戴高乐主义”与法国的战略自主性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从经济、政治和安全等方面对欧洲实施利用和打压相结合的政策,试图巩固自身在欧洲的领导权。随着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建立,美国的霸权政策与追求“伟大、独立”的“戴高乐主义”迎头相撞。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重塑法国世界大国地位的目标不但与美国追求的最高目标相抵触,还对美国在大西洋联盟内部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因此法国的北约和欧洲政策遭到了美国的连续打击。在此背景下,戴高乐选择向外拓展战略自主性,奉行“东方政策”以实现本国的战略目标。^①

1958年9月17日,戴高乐在致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和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的备忘录中正式提出在大西洋联盟内建立“三国指导机构”的建议,要求法国获得与美国、英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同年10月20日,艾森豪威尔复函拒绝了戴高乐的建议,强调不能让其他盟国觉得它们被排除在对其利益至关重要的决策外。^②这说明在1958年法国就与美国存在联盟的主导权之争,法美双方的战略目标分歧在此时已不可兼容。1962年1月9日,戴高乐再次向美国提出建立“三国指导机构”的要求,又遭到肯尼迪政府的拒绝,^③法美两国在北约主导权上的分歧进一步加深。戴高乐表示,法国要在联盟内坚

^① “东方政策”是“戴高乐主义”的重要体现。维护法国民族独立与尊严、提高法国大国地位是“戴高乐主义”的实质。

^②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八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415—416页。

^③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九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

持“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精神、自己的行动和政策”,决定采取行动挑战美国的权威。^①美国显然低估了戴高乐追求法国大国地位的决心与意志,之后的历史也证明法国并未因美国的反对放弃追求大国地位的目标。

在寻求与美国共享北约主导权的计划失败后,戴高乐开始转向追求由法国主导的欧洲国家合作,主张建立以法国为核心、以法德轴心为基础的“欧洲人的欧洲”,试图让西欧摆脱美国的控制。为此,戴高乐积极推动法德和解。自1958年9月14日法德两国领导人会晤至1963年10月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去职,双方会晤多达15次,会谈累计100多个小时。^②1963年1月22日双方签署法德合作条约即《爱丽舍宫条约》,不仅实现了两国的历史性和解,还建立了“法德协调”机制,形成了“巴黎—波恩轴心”,这为推进西欧国家的联合提供了领导核心和重大动力。^③然而,戴高乐追求的欧洲目标与美国的观点相背离,“欧洲人的欧洲”设想也是美国无法接受的。美国支持欧洲联合和法德合作的前提是它们都必须处在美国领导的大西洋联盟的框架内。因此,肯尼迪政府采取了针锋相对的举措应对戴高乐的欧洲联合方案,提出建立大西洋共同体的设想并支持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来牵制法国。即便法国两次否决了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但是美国通过加强自身对欧洲的影响和控制并联合其他盟国挫败了戴高乐的欧洲联合计划。美国与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围绕西欧主导权的激烈竞争最终以法国的失败告终。

1958—1963年,无论是对北约领导权的争夺还是对西欧主导权的竞争,法国都处于接连失利的境地。在此期间,戴高乐一方面采取了一些有限脱离北约一体化组织的行动,试图逼迫美国妥协。例如,1963年1月法国拒绝将其原驻阿尔及利亚的军队划归北约指挥,同年6月21日宣布法国大西洋舰队在战时不再“自动”归北约指挥,并收回了北约对法国飞机中队的指挥权。^④另一方面,戴高乐在美苏两极对峙中坚定地与美国保持了步调一致。无论是1958年的第二次柏林危机、1961年的“柏林墙”修筑还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法国都比其他盟国“更加迅速、更加完全地支持美国”。^⑤但戴高乐意识到,在现有的美法同盟内法国要实现“戴高乐主义”的目标基本不可能。因为法国关于欧洲建设和北约问题的要求和政策都超出了美

①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戴高乐言论集(1958年5月—1964年1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353页。

② 夏尔·戴高乐著,《希望回忆录》翻译组译《希望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页。

③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八卷),第421页。

④ 周荣耀《戴高乐评传》,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230页。

⑤ 阿尔弗雷德·格鲁塞著,陆伯源、穆文等译《法国对外政策1944—1984》,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96页。

国所能接受的限度。从本质上讲,法国争取大国地位的目标是对美国大西洋联盟霸主地位的挑战,这注定无法被美国包容。也就是说,美法之间的目标分歧成为法国争取大国地位的主要障碍。如果在同盟内部继续谋求与美国平起平坐,那么法国仍将受挫。戴高乐将法国此时的处境框定在损失框架中,在损失厌恶原理的作用下,法国必须承担风险去突破这种束缚,积极谋求战略自主性,才有可能实现本国的战略目标。

法中建交是戴高乐谋求战略自主性的一项惊人成就。1961—1962年,在法美矛盾升级的背景下,中国适时发展中法关系。自1962年开始,戴高乐在同其政府官员、同盟国政府首脑的谈话中多次谈及发展法中关系问题,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戴高乐谋求承认新中国的首要原因在于,1962—1963年法美在 NATO 领导权、欧共体建设及法德和解等问题上的分歧尖锐化,法国需要在西方联盟外寻求支持,实现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目标。^①在中法都谋求改善双方关系的时候,1963年10月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访华,中法两国就建交的实质性问题展开讨论。

虽然法国对富尔的访华使命严格保密,但美国已有所觉察并认为戴高乐可能在“最近”承认新中国。^②自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持续实行遏制与孤立新中国的政策。美国担心法国承认新中国将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导致美国的对华遏制政策破产,并将中国成功地带入联合国。^③于是,自1963年10月到1964年1月中旬,美国不断向法国施压,要求其继续维持不承认新中国的立场。美国驻法大使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和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先后于1963年12月5日和16日与戴高乐就中国问题交谈。在关于法中建交的时机上,戴高乐保证在采取此类行动之前会通知美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1963年12月17日宣称,美国已经得到了戴高乐的保证,法国目前没有承认新中国的计划,以此向法国施压。这一说法立即遭到了法国的否认,法新社在同年12月18日发表声明,确认法国在承认中国问题上“保持着行动自由”。^④

1963年12月12日至1964年1月23日,中法两国又在瑞士伯尔尼进行了四次正式谈判,最终达成了建交协议。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并商

^① 姚百慧《中国对法政策调整与富尔一九六三年中国之行》,载《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5期,第39—40页。

^② 姚百慧《冷战时期中美法关系研究》,九州出版社2016年版,第70页。

^③ 顾宁《美国“遏制但不孤立”中国政策提议的历史由来、反响及其意义》,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1期,第47—55页。

^④ 姚百慧《冷战时期中美法关系研究》,第70页。

定在三个月内互派大使。^① 美国干预中法建交行动失败说明美国已无法控制法国向中国拓展战略自主性的行动。当戴高乐决心打开法中关系的大门时就不会顾及美国的态度。

早在 1960 年 3 月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应邀访问巴黎时,戴高乐便提出“在我们大陆范围内依次实现缓和、互相谅解和合作”,并“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建立欧洲人之间的往来联系”的政策主张。^② 然而,1960 年 5 月至 1963 年夏天,受修筑“柏林墙”、古巴导弹危机和《爱丽舍宫条约》等因素影响,法苏两国关系缓和的趋势停顿。自 1963 年开始,法国一改对苏联实施的谴责、敌视和抗衡政策。这一转变很大程度上源于法国在法美同盟中一直处于遭受损失的态势,从而显露出风险承担的特征,希望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以拓展自身的战略自主性。1964—1965 年,法国加快了与东欧接近的速度,几乎所有东欧国家的外交部部长都访问了巴黎,^③这种趋势在 1966 年戴高乐访问苏联时达到高潮。戴高乐提出的“缓和、谅解、合作”三部曲政策也正是通过他这次访苏真正得到贯彻和实施。这不仅是戴高乐的“三步东方政策”,而且是他实现“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大欧洲”这一长远设想的基本手段。值得一提的是,20 世纪 70 年代初由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推行的“新东方政策(Ostpolitik)”可以说是受到了戴高乐“东方政策”的启迪。^④

1966 年 3 月戴高乐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提出法国军人将于同年 7 月 1 日前撤出北约军事指挥机构,同时要求北约军事指挥机构和外国军队在一年内离开法国。美国约翰逊政府随即采取一系列报复行动,包括扬言收回法国驻联邦德国军队使用的核弹头。^⑤ 而戴高乐依旧携带着这份“见面礼”于同年 6 月 20 日至 7 月 1 日对苏联进行了为期 10 天的正式访问。由此可见,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和戴高乐紧随而来的访苏之行是法国拓展战略自主性的重要表现。戴高乐此行除在国际重大问题上同苏联找到汇合点外,还建立了法苏特殊伙伴关系,为发展法苏政治磋商以及在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长期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最重要的是“在克里姆林宫与爱丽舍宫之间建立一条直接的通信联络线路”,如同

① 黄庆华《中法建交始末:20 世纪 40—60 年代中法关系》,黄山书社 2013 年版,第 340—357 页。

② 布莱恩·克罗泽著,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等译《戴高乐传》,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679 页。

③ 周琪、王国明《战后西欧四大国外交(英、法、西德、意大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04 页。

④ 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80 页。

⑤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1989》,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41 页。

克里姆林宫和白宫之间的“热线”那样,法国的大国地位因而得到了苏联的确认。^①戴高乐追求战略自主性的行为促使西欧对苏联和东欧从冷战到缓和、从对抗到对话转变,跨出了走向20世纪70年代东西方缓和的第一步,这与假说3a相吻合。此外,在一些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事件中,法国常常同东方国家站在一起。例如,1965年法国反对美国出兵干涉越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明确支持阿拉伯国家,停止支持以色列并对其实行武器禁运,并在联合国投票赞成苏联要求以色列撤军的提案。^②

(二) “波兰式道路”与波兰的战略自主性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提出“每个国家,每个共产党都有权寻求自己通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不必照搬苏联模式”,使各国享有主权和独立开始在理论上得到尊重。而1956年发生的波兰“十月事件”反映了波兰和苏联在理解实现社会主义目标道路上存在分歧。美苏关系缓和的趋势也为波兰和西方开始往来打开了短期机会窗口。在建立起非对称同盟体系下波苏平等关系的基础上,波兰在不脱离与苏联的同盟关系和华约组织的情况下,能够获得苏联对其经济和外交政策的容忍,从而拥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波兰得以开东欧“卫星国”风气之先,展开积极的“西向”经济外交,从美国获得经济贸易援助,解决国内的经济困难。

1948年12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制订了“六年计划”(1950—1955年)。1955年“六年计划”结束后,虽然波兰经济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造成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以农产品为主的消费品市场供不应求,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实质性提高。^③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波兰照搬苏联模式,按“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导致波兰经济畸形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成为苏联的“卫星国”,波兰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贸易管制,失去了西方传统市场和投资,也无法从西方特别是美国进口农产品。冷战前波兰的对外贸易有一半以上是同西方国家进行的。^④到1956年,波兰国内危机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随着波兹南事件的发生,人们越来越感受到套用苏联模式的弊端,认识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提出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式道路”是正确的。^⑤苏联因此担心波兰会追求有别于苏联的道路甚

① 阿尔弗雷德·格鲁塞《法国对外政策1944—1984》,第203页。

② 王毅《试析戴高乐关于促进东西方缓和的设想》,载《外交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第81页。

③ 刘祖熙、刘邦义《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57—60页。

④ 杨友孙《波兰演变的美国因素探析》,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66—68页。

⑤ 哥穆尔卡在比较了苏联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的优缺点后,取长补短,提出了介于两者之间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式道路”。

至退出华约、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决定对波兰实行干预。由此可见,这时候苏联单方面认为波苏之间的目标分歧不可兼容,波兰选择走“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等同于挑战苏联在东欧的领导地位。

1956年10月1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开幕日的凌晨,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代表团不请自来,并命令苏联军队包围华沙,企图以武力要挟波兰统一工人党接受苏联干预的人事任命。在双方会谈中,波兰领导人被指责“盲目效仿南斯拉夫”,哥穆尔卡回答说“我们并未仿效任何人,我们在走波兰自己的道路”。^①他还向赫鲁晓夫保证“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②波兰仍将是华约的“坚强一环”。在了解到波兰形势的真实情况后,苏联认识到苏波之间的目标分歧是可兼容型的,双方只不过是对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道路存在不同理解:苏联认为通往这一目标只能沿用苏联模式,波兰则认为实现社会主义“这个目标的道路可以是不同的,而且也的确是不同的”。^③苏联开始允许包括波兰等东欧国家在理解社会主义目标道路上出现某种程度的偏离。只要这种目标分歧没有超出苏联可容忍的限度,波兰追求某种程度的独立自主便能被苏联接受。

1956年“十月事件”是波兰追求战略自主性的前奏。一方面,波兰成功抵制了苏联的干预。波兰统一工人党选举产生了改革派占优的新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哥穆尔卡正式当选为党的第一书记,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Konstantin Rokossovsky)等亲苏派则被排除在外。^④另一方面,波兰成功改变了自1945年4月21日以来的波苏不平等同盟关系。1956年11月15—18日,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访问苏联,波苏签署联合声明,宣告波苏同盟“将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得到扩大和加强”。^⑤上述声明确保了波苏同盟关系的稳定性,为波兰追求战略自主性提供了坚强后盾。波苏两国还商定暂时驻扎在波兰的苏军不得侵害波兰主权和内政,其任何调动和演习都应由波苏双方协商决定。^⑥波苏关系调整前后,波兰始终都把维持两国同盟关系和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框定为“既得的禀赋”,不敢冒险与西方交往而改变现状。

^① 刘邦义《哥穆尔卡评传》,第178页。

^② 刘邦义《哥穆尔卡评传》,第182页。

^③ 刘彦顺《波兰十月风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113页;扬·普塔辛斯基著,于欣等译:《哥穆尔卡的改革探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④ 由于罗科索夫斯基被看作苏联控制波兰的象征,所以他的落选与哥穆尔卡重返政坛即意味着赫鲁晓夫粗暴干涉波兰内政的失败。在苏波党际关系史上此次事件也是少有的波兰政党成功抵制苏共干预的事例。

^⑤ 《关于波兰目前的局势》,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67页。

^⑥ 刘祖熙、刘邦义《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第103页。

但如果仅与苏联互动无法有效缓解国内经济困难尤其是农产品严重短缺问题,那么波兰便会将与西方重启经贸联系视为扩大收益。

短暂机会窗口的出现是波兰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期追求战略自主性的重要因素。当时,美苏关系出现缓和趋势,这是赫鲁晓夫实施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即“三和路线”和美苏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①“三和路线”的核心和实质是苏联在谋求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平共处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自身经济和军事实力,最终实现美苏合作,共同控制世界。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的历次美苏首脑峰会虽然并未使双边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而更多只是阐述各自的观点和寻求了解对方的观点,但如果把它们看作美苏由全面对抗走向有限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对缓和双边关系显然是有益的。^②美苏关系缓和的趋势并非单纯基于对话,而是建立在双方实力相对稳定和平衡尤其是核均势基础之上。随着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发展,美苏实力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1957年苏联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和人造卫星不仅表明其在技术上的新突破,还说明从军事和战略上苏联第一次具备了直接攻击美国本土的能力。^③1955—1963年美苏关系缓和尚处于初级阶段,主要是因为对立和冲突仍是当时美苏关系的主导面,双方没有足够的动机追求实质性的关系缓和。与冷战初期相比,虽然美国仍占据实力优势,但美苏竞争的烈度有所降低。随着全球战略环境从相对约束变为包容,波兰迎来了一个短暂的机会窗口,其外交表现出从风险规避到风险承担的特征,开始向外谋求战略自主性。

波兰谋求战略自主性的高潮是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建立起以经济贸易为主的关系。波兰“十月事件”发生后,美国开始就援助问题同波兰接触,并且声明美国的援助只是为了使波兰得到“自由”而别无他求。波兰认为西方误解了波兰事态:波兰始终追求社会主义道路,苏联仍是波兰的盟国;波兰不需要美国的特殊照顾,只需要恢复波美间以国际市场价格为基础的正常贸易关系和相关商业贷款。^④显而易见,在同苏联的经济合作有进一步发展前波兰接受美国的无偿援助只会影响波苏关系,甚至可能导致苏联加大干涉波兰事务的力度。由此可知,波兰是在顶着苏联压力的情况下开启了波美

①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摘录)》,载国际关系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45—1958)总论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456—488页。

② 理查德·科罗克特著,王振西主译《50年战争》,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页。

③ 黄正柏《美苏冷战争霸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7—136页。

④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FRUS), 1955—1957, Vol.25*,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0, pp.287—289, pp.317—318, pp.351—352, pp.406—407.

经济往来。1956年11月18日,波苏两国在联合声明中宣称,苏联同意免去波兰22亿卢布的债务,作为补偿其在1946—1953年由于按低价向苏联供应煤炭而遭受的经济损失。^①来自苏联的经济支持增加了波兰与美国就援助问题进行谈判的筹码。此后,哥穆尔卡改变了过去拒绝接受美国经济援助的态度。

1957年2月26日,中断10年之久的美波经济会谈在华盛顿正式拉开序幕,双方主要围绕《农产品贸易开发与援助法》(又称《480公法》)、最惠国待遇以及援助和贷款协议进行谈判。但谈判进展缓慢,主要因为美波双方的期待值差距太大。波兰力求在不过分刺激苏联的前提下迅速争取尽可能多的美援以缓解眼下的经济困难,美国则是寻求长远效应以减小波兰对苏联的依赖。^②最终,1957—1960年波兰从美国进口了总计3.653亿美元的农产品。1960年11月17日,波兰再次享受到美国的最惠国待遇。1957—1963年,波兰获得了美国提供的5.88亿美元的低息贷款。^③美国不仅在经济贸易上向波兰提供支持,还帮助波兰进入国际经济合作组织。1957年波兰成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观察员,1958年加入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可见,1956—1963年的波兰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战略自主性,得以与美国发展以经济贸易为主的外交关系。波兰不仅从中获得了建设国内经济社会所急需的贷款、投资、经济援助和廉价农产品等,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对苏联的依赖,并使波兰在对外政策方面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以及讨价还价的能力”。^④波兰或凭借苏联对自身的支持增加同美国进行经济谈判的筹码,或借助美国的援助从苏联方面获得更大的自主权,从美苏双方获得了双重支持。

(三) 案例分析

在美苏两极格局下,无论是美国主导的西方联盟还是苏联主导的东方联盟,都出现了盟国积极追求战略自主性的情形。本文分别选取法国和波兰两个案例进行了探讨。法国与美国的目标分歧不可兼容,法国谋求大国地位的战略目标不仅阻碍了美国实现维持其在欧洲霸权地位的战略目标,还威胁到美国在同盟内的主导地位。为此,法国通过采取“东方政策”追求战略自主性。波兰与苏联的目标分歧可兼容,只是在

^① 刘祖熙《波兰通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97页。

^②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FRUS)*, 1955-1957, Vol.25, pp.608-610, pp.611-613, pp.614-618.

^③ Stephen S. Kaplan, "United States Aid to Poland 1957-1964: Concerns, Objective, and Obstacles,"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28, No.1, 1975, pp.147-166; Jerry F. Hough, *The Polish Crisis: American Policy Option*,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82, p.9.

^④ John C. Campbell,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The Choices Ahead*,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65, p.65.

如何理解战略目标的实质内容上存在不同看法。随着体系环境的变化,波兰通过走“波兰式道路”实现了战略自主性。

表3 法国和波兰追求战略自主性情况

案例	体系结构	目标分歧类型	体系环境	战略自主性行动
法国	美苏两极格局	不可兼容	约束	“东方政策”
波兰	美苏两极格局	可兼容	从相对约束到包容	“波兰式道路”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此外,本文还考察了法国和波兰战略自主性转化过程中的风险偏好(见表4)。法国对与美国目标分歧的盈亏态势判定是为规避损失,因为法国所要追求的战略目标已触及美国的底线,无法在美法同盟内实现。因此即便处在约束性体系环境下,法国也愿意承担风险追求战略自主性。波兰对自己与苏联目标分歧的盈亏态势判定是扩大获利,虽然照搬苏联模式有助于波兰重工业蓬勃发展,但是结合波兰国情走“波兰式道路”、与西方恢复经贸联系则能改善国内总体经济状况。因此当体系环境发生从相对约束到包容的改变时,抓住短期机会窗口的心理动机促使波兰由规避风险转变为愿意承担风险,追求战略自主性的倾向有所增强。

表4 法国和波兰战略自主性转化过程中的风险偏好

案例	盈亏态势判定	风险偏好	体系环境变化是否改变风险偏好	转化的可能性
法国	防止损失	承担风险	否	高
波兰	扩大获利	由规避风险到承担风险	是	从低到高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五 结论与启示

在不对称同盟中,并非所有盟国都被主导国完全支配。在特定条件下它们能够脱离主导国的控制甚至违背主导国的意愿,以独立自主姿态游走于主导国及其竞争对手之间。本文主要探讨了盟国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实现对战略自主性的追求,并以盟国与主导国的目标分歧属性为自变量,以体系环境的变化为调节变量,以盟国的战略自主性为因变量进行分析。通过分析盟国追求战略自主性从偏好转化为行动的条件可以

发现:第一,在盟国与主导国战略目标一致的情况下,盟国更倾向于维系同盟内部的关系,而不会选择对外拓展战略自主性。第二,在盟国与主导国产生目标分歧的情况下,盟国有意尝试改变同盟现状,考虑追求战略自主性。第三,如果双方的目标分歧不可兼容,为防止损失盟国会倾向于将追求战略自主性的偏好转化为行动。第四,如果双方的目标分歧可兼容,那么只有在体系环境发生变化并打开机会窗口时,盟国才会将谋求战略自主性的偏好付诸行动。

战略自主性属于战略研究议程中一项重要的子议程,能够为中国更好地看待美国盟国追求战略自主性这一现象提供参考。首先,有助于理解两极之外的国家维持和拓展战略自主性的行为选择。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地区大国和小国都有可能做出类似法国和波兰那样追求战略自主性的行动,从而尽可能地扩大自身的战略选择空间和灵活性。

其次,有助于大国更好地管理和维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在不断建立与升级伙伴关系的过程中,中国应当更加重视对相关国家目标分歧盈亏态势的预判,及时协调与伙伴国家的战略目标分歧,有效管控分歧、妥善化解矛盾并及时解决问题。

最后,反推战略自主性的转化条件可以为大国分化对手的同盟提供有益的启示。事实上,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并非铁板一块,彼此在战略目标方面不乏分歧。弱化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可以从美国及其盟国之间战略目标分歧的兼容性出发,通过“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对其部分同盟进行分化。如果盟国与美国的目标分歧不可兼容,那么只需配合其盟国追求战略自主性的行动即可;如果盟国与美国产生的目标分歧是可以兼容的,可以通过营造包容的战略环境改变美国盟国的风险偏好,促使其追求战略自主性。

(截稿:2022年12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Goal Discrepancy , International System Environ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Strategic Autonomy in an Asymmetric Alliance

Lu Yinglin Xu Jin (147)

【Abstract】Strategic autonomy means the ability of an ally in an asymmetric alliance to go against the wishes of the dominant power , or even resist its pressure , and make its own strategic choices on issues of vital national interest. During the Cold War , the relatively weak alliance members in the Eastern camps and Western camps have resisted the pressure of dominant powers to pursue their strategic autonomy. Goal discrepancy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environment can cause an ally to transform strategic autonomy from preference to action. When the goal discrepancies are incompatible , allies tend to take risks to prevent losses and have a high probability of pursuing strategic autonomy. When the goal discrepancies are compatible , allies tend to avoid risks to gain more benefits and have a low probability of pursuing strategic autonomy. But when the systemic environment changes , to seize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 the state prefers to suffer higher risks to seeks strategic autonomy. By comparing the US-French relations and Soviet-Polish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conditions and mechanism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allies' strategic autonomy. These findings not only help China encourage and exploit the strategic autonomy of US allies' choices to check and divide the US alliance system , but also shed light on how China can better manage its global partnership network.

【Key Words】strategic autonomy , asymmetry alliance , bipolar pattern , goal discrepancy , international system environment

【Authors】Lu Yinglin ,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u Jin ,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and Senior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